

# 忆梁思成先生与北京近代建筑研究

## In Memory of Liang Sicheng: The Study of Modern Architecture in Beijing

傅熹年

FU Xinian

1956年9月，中国科学院土木建筑研究所派我到中国科学院与清华大学建筑系合办的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工作，实现了我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夙愿。研究室设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内，梁思成先生任主任。

1957年，研究室确定了各位教授专家的研究专题。梁先生的专题为《北京近百年建筑研究》，梁先生大的研究方向是研究中国近百年建筑，即1840年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的建筑，目前先从北京开始。当时决定由梁先生的副博士研究生王其明学长、虞黎鸿同学与我三人任他的助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对梁先生所拟定的北京近代建筑实物进行实测、绘图、拍照，并收集文献资料，撰写分项调查报告，为梁先生的研究专题收集和积累素材。

这样，我们就有机会直接向梁先生汇报工作进展和存在问题，得到梁先生的教诲和指导。梁先生的细心指导、严格要求，给我们以极大的教益和鼓励。1957年3月初，梁先生亲自带领我们三人在北京作了一次示范性调查，参观了东西交民巷、前门外大栅栏、王府井大街，天主教的东堂、北堂、西堂等有代表性的近代建筑实物，并拍了一些照片。当时对拍街景和建筑较敏感，不时有公安人员来询问甚至制止，梁先生只得拿出他的全国政协委员证书来释疑。在参观东交民巷圣米歇尔教堂时，我为梁先生拍摄了一张照片，虽受到梁先生不许再使用公家胶卷拍私人照片的严肃批评，却为梁先生主持此项研究工作留下了唯一的一张照片，弥足珍贵（图1）。以后即由我们三人进行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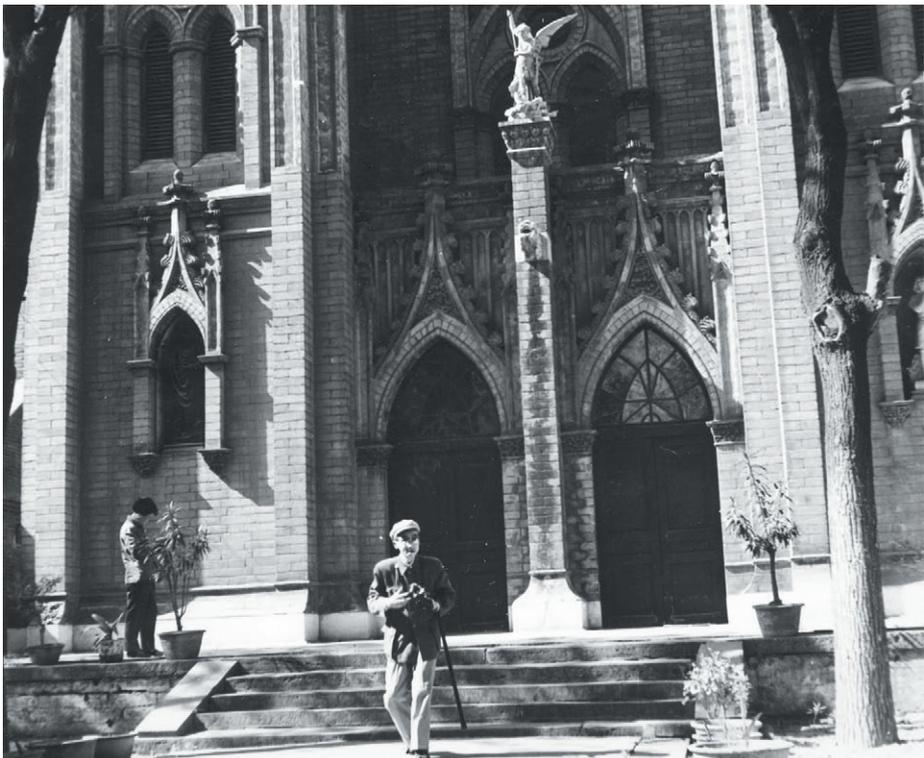


图1 梁思成调查北京圣米歇尔教堂留影  
(傅熹年 摄, 1957)

体工作，终日外出调查、进行测绘、拍照，并广泛收集资料。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梁先生都会及时帮助解决。如当时原北京大学红楼、外交部大楼、北京北洋军阀国会、清末所建大理院等都是北京有代表性的近代建筑，但都不对外开放，是梁先生与当时中宣部的周扬同志、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同志和新华社的领导同志等联系后我们才得以进行调查的。至年终，所拟重点对象已调查过大半，也得到一些珍贵资料，如北洋军阀国会的设计图、清末英国通和洋行设计的有清代大理丞董康签字的大理院（相当于最高法院）的立面图等（图2），也得到梁先生的鼓励。在梁先生指导下工作，可以感到他对工作质量的要求颇高，要求我们调研和收集材料要耐心、细致，一些效果不佳的照片和不够精细的测绘图他有时要我们重照、重测、重绘。

此外，他对我们的学习也很关心。1957年2月的一天梁先生很兴奋，告诉我们他刚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还把笔记本上所记的内容选了两段读给我们听，认为十分重要，要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一次我中午去找梁先生，当时他家中有客人，三位客人围方桌而坐，桌上摆了纸笔文具。他对我介绍了客人，我只记得一位是崔月

犁，一位是范瑾。他说现在有客人，你明天再来吧。过后一两天，即在报上读到梁先生所写《整风一月的体会》的文章。他在文中非常严肃地批判一些人不正确对待整风等问题。但他在此情况下仍然敢于在文中提出反对拆北京城墙的意见，并说感到揭城墙砖如同揭他自己的皮一样痛苦，这严肃表明他是从内心里真正爱护古代建筑遗产的，极值得我们钦敬和学习。但到整风反右后期，他“揭皮”的说法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仍然遭到激烈的批评，认为他在严肃的文章中说了不严肃的话。

梁先生有时也很幽默，当时建筑系老师多被尊称为“公”，如梁先生称“梁公”，刘致平先生称“二刘公”（“大刘公”是刘敦桢先生），吴良镛先生称“小吴公”（当时吴先生最年轻）。但梁先生却几次告诉我们不要再称他为“梁公”。一次我去他家中找他，敲门，同时并问“梁公在家吗？”他在室内回答：“梁公不在家！”我赶紧改口称“我找梁先生”，他才含笑给我开门，并指着我的鼻子说“不许再叫梁公了！”这些情况虽至今已时隔近逾六十年，但回想起梁先生对古代建筑遗产的深厚感情，对工作的严格要求，对学生的亲切关怀与教诲，他的音容笑貌仍宛然如在目前，使人肃然起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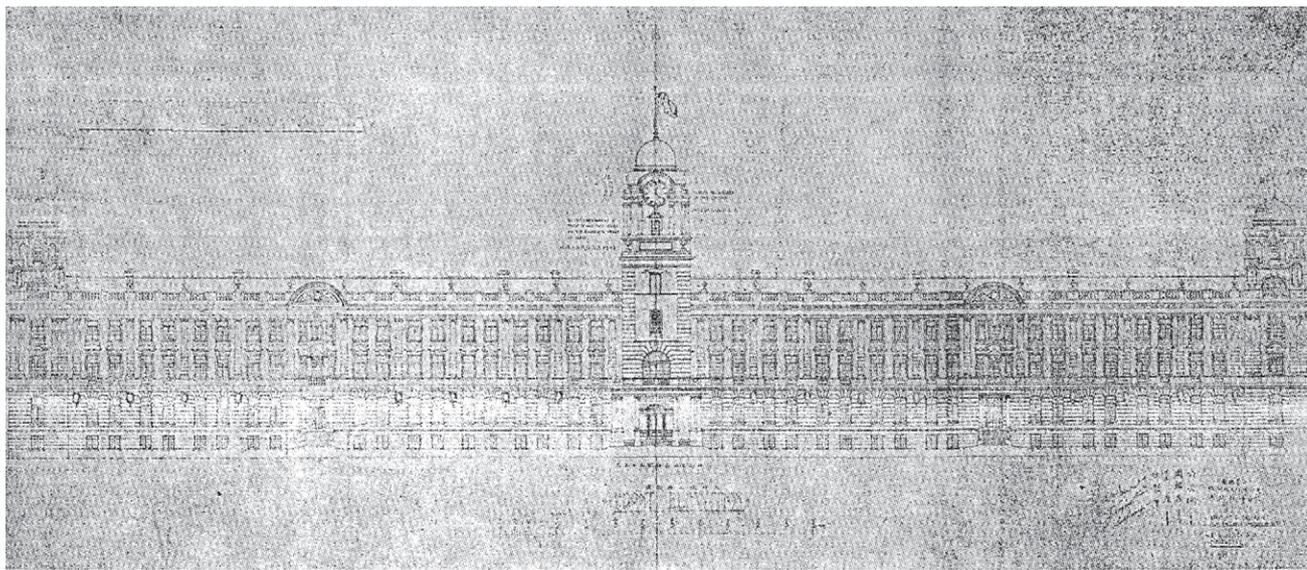


图2 清末英国通和洋行所绘大理院设计图

(张复合. 北京近代建筑史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